



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评介（陈居渊）

陈居渊 《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》第四辑

说到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著作，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无疑是学界最为熟悉的一种。由于该书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学都有精到的描述，而且有一定的系统性，尤其是经过周予同先生的注释，现在已成为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必备参考书。作为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佳作，皮著显然不是唯一的，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有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所编撰的《经学教科书》。

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，字申叔，号左庵，江苏仪征人。光绪二年（1902）举人。次年赴开封会试受挫，在归途中经上海时结识了章太炎，并受章太炎思想影响，改名光汉，担任《警钟日报》、《国粹学报》撰述，宣传“排满革命”。1905年因《警钟日报》被清廷查封，他逃往嘉兴、芜湖等地。1907年东渡日本，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因自视甚高，企图出任同盟会东京本部干事之职，遭拒绝后心怀怨愤，在其妻何震的劝说下，于1908年入清两江总督端方幕府。辛亥革命后，曾加入“筹安会”拥护袁世凯称帝。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刘师培被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。1919年主编《国故》月刊，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。这年的11月，因肺病死于北京大学。刘师培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众多著述，计有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、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、群书校释24种等，一并收录于1939年由钱玄同编辑的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中。

刘师培的经学研究，渊源于他的家学传统。他的曾祖刘文淇、祖父刘毓崧、伯父刘寿曾世居江苏仪征，都是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，而且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《春秋左氏传》而著称。刘师培自幼受家族文化气氛熏陶，从开蒙起便饱读经书，八岁时便掌握了《周易》的卦变方法。他在《甲辰年自述》诗中不无自负地说：“童蒙学《易》始卦变，爻象昭垂非子虚。”不过，刘师培更多的是“独抱麟经承祖业”，继承了刘氏世代研究《左传》的家学。他先后撰述了《左传一地二名考》、《官制异同考》，以及关于南北朝经学形成、汉代与宋代经学的异同、清代经学的得失以及近代经学的发展等一系列经学论著。

《经学教科书》按时代先后把传统经学析分为两汉、三国至隋唐、宋元明、清代等四派。从学术角度有意识地对传统经学分派始于清代，如于隆年间的“不过汉学、宋学两家，互为胜负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的两分说。嗣后有三分说，嘉、道间龚自珍分以汉学、宋学、清学（国朝学）三派，康有为则分为汉学（西汉今文经学）、新学（汉代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）、宋学三派。后来又有叶德辉的四分说，即今文经学、古文经学、郑氏学、朱子学。周予同先生在注释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的序言中采纳了康有为的三分说，并对包括刘师培在内的派别划分说进行了评判，认为刘师培是“强以时代分派”。研究经学史，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经学进行派别划分，而经学史上的今古文、汉宋之争又是分派所无法避免的，仔细推敲一下上述不同的分派就可发现，它们本质上仍是依据汉、宋两分说再作进一步的细化。分清今古文、汉宋之争固然重要，但作为史的研究来说，上述分派没有一定的时间界限又显得过于模糊，所以到了刘师培、皮锡瑞的经学史研究时，几乎都采取了时段划分法，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将先秦至清代的经学分为十个时代，而刘师培则采取了折衷内涵和时代区分的四分法（如果去掉刘氏分法中的三国至隋唐这一段，与其它的分派没有大的区别）。他们的




划分是否妥当是可以进一步研究。

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的第一册是历代经学史的概论（这一册当时在学界流行最为广泛），他按时代顺序、以专经的形式总结了历代经学研究的特点及成果，虽然只是论其大略，却见解精到，基本做到举要籍、明源流、辨得失、重考证，言简意赅而无轩轻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很少门户之见。作为近代古文经学大师，刘师培当然是站在古文经学的角度研究经学史的，如他认为六经之一的《乐经》因秦代焚书而失传，不得已以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作为六经的补充而成为七经的事实。这显然与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《乐经》，《乐》包含在《礼》与《诗》中的见解相异趣。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经学的观点自限，而是认为“大约古今说经之书，每书皆有可取处，要在以己意为折衷耳”，显示了较为开放的心态。如论汉代经学，则认为今文与古文“各有偏长”。又如清代朴学家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代的经学研究，刘师培则坦言其“新义日出”，“多自得之见”。又如他对《易》学史的研究，虽然接受了清代焦循的《易》学，但并不囿于象数与义理，诚如他在第二册的弁言中所说：“惜汉儒言象、言数，宋儒言理，均得《易》学之一端，若观其会通，其惟近儒焦氏之书。故今编此书多用焦氏之说，以刺旧说者十之二，参臆者十之三。”焦循的《易》学研究，在清代被推崇为“石破天惊”，其实，焦循在传统象数易学的外壳下，走的是近代数学建立公式化体系的路子。从根本上说他并没有跳出象数易学，可贵的是他试图寻求一条贯通《周易》全经的新路，显示出清代乾嘉之际象数易学研究的变形。不过，刘师培还暗取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易学思想。如他在所言易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时，所引内容全系抄录叶适所著的《上下经总论》一篇。该篇总论六十四卦中五十二卦的意义，并颇为自负地说：“皆因是象，用是德，修身应事，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。”也正是在叶适、焦循易学的启迪下，刘师培采纳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，并贯穿于他的经学史研究中。如在论及《易》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时指出：《序卦传》专言“社会进化之秩序，于野蛮进于文明之状态，言之最精”。又说：“《易经》一书言进化而不言退化，彰彰明矣。”这体现了他发掘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的理论尝试。

正因为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有以上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色，所以《经学教科书》虽仅有篇幅不大的二册，而且以教材形式来写作也约束了他在某些方面作进一步发挥，却与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在近代同享盛名，一直为后来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学者所重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复旦大学哲学系）

 [关闭窗口](#)  [发表, 查看评论](#)  [打印本页](#)

发表日期：2005-1-20 浏览人次：349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